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人物文集系列

马君武集

莫世祥 编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人物文集系列

马君武集

莫世祥 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君武集/莫世祥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人物文集系列)

ISBN 978-7-5622-5127-9

I. 马… II. ①莫… III. ①马君武(1881~1940)—文集 ②中国历史:近代史—史料—文集 IV. ①C53 ②K25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6235 号

马 君 武 集

编者:莫世祥 ①

责任编辑:庞 丹

责任校对:罗 艺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9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30.25

字数:440 千字

版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500

定价:88.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总 序

章开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辛亥百年。作为辛亥革命的研究者，我自然感慨万千。

首先想到的，就是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的那段话：“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

过去有些论者，常常讥刺孙中山为空想主义者，其实大谬不然。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时时事事都从实际出发。他不仅密切关注现实，还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他没有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完美无缺的样板，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总结既往百年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所选择“因袭”，更有所斟酌“规抚”，从而才完成新的“创获”——“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百年锐于千载”是孙中山对于同盟会成立以前那一百年世界历史的精辟概括，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形容同盟会成立以后这一百年的世界历史，因为20世纪的“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等，其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更远远超越了19世纪那一百年。我很重视“百年锐于千载”这句话，认为只有透过这前后两个一百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才能更为深切地理解辛亥革命。

我们钦佩孙中山，因为他在伦敦总结 19 世纪百年历史并思考人类文明走向时，并无任何具有实力的社团作为依托，主要是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督策使然。他在大英博物馆漫游书海，几乎是孑然一身，固守孤独。然而他并不寂寞，他的心与祖国、与受苦民众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与世界各地善良的同情者联结在一起。他把祖国命运放在世界命运中间认真思考，并且像耶稣背负十字架一样，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沉重课题。

我们钦佩孙中山，还因为他在百年以前思考的问题、探索的思路以及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各方面实践，都已经成为宝贵遗产，在此后百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产生影响。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更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更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像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运动一样，它有自己的前因，也有自己的后果，而前因与后果都有连续性与复杂性。我们不是辛亥革命的当事人，没有任何亲身的经历与见闻；但是作为后来者百年以后看辛亥，可能对当年的若干重大问题观察得更为客观、全面、深切，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探索其前因后果的连续性与复杂性，具有更多的方便条件。

因此，我们反思辛亥百年，应该在连续性与复杂性方面多下工夫，换言之，就是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

仅以三民主义为例，就能引发许多新的思考。

首先是民族主义，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的实质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对“五族共和”的阐释。其实，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开创于初始，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应该承认，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至少我们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总体观念上与前人是一脉相承的。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增进民族平等、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乃至促进少数民族内部社会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在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方面仍然存在着若干问题，仍然需要从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作为历史遗产，辛亥革命也有负面的因素。为鼓动民众推翻清

王朝而狂热地鼓吹“排满”，显然对早已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有所助长，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对历史还是对现实的看法中这些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显现。即以 20 世纪初期革命报刊极力制作宣扬的“黄帝文化”而言，至今我们一味“弘扬”而未能有所“扬弃”其汉族中心主义内涵。所以我自去年以来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这样才能更为增进对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

其次是民权主义，回顾过去百年，也会有许多新的认知与感受。辛亥革命使共和国从此深入人心，此话不错亦非虚，但这次革命也仅仅是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以孙中山自己为例，他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是，对于这个理念懂之者不多，应之者甚少，连孙中山自己也还缺乏相关的架构设计。直到 1920 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逐步把“五权宪法”从抽象理念形成完整的国家体制框架。概括起来，无非是：（1）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2）“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3）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他认为，如此既可防止议会专制，又可杜绝政府腐败；既可实现直接民权，又可实现“万能政府”，堪称民权主义的完美境界。

但是，“五权宪法”倡议以来，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其后逐步演变得荒腔走调，更非孙中山所能预料。应该说，“五权分立”的立意还是积极的，即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监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国民党内外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服膺者也并非都是虚应故事，其中确实有些忠贞之士满心期望通过“五权宪法”的实施，把中国引向民主与法制的进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现实，“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只能

流于虚有其表的形式。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介石死后，迫于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正是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真正在台湾的政治实践中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无论西方与东方，特别是在东方，民主政治在任何国家的成长、完善，都必然要经过一条漫长、复杂、曲折而艰苦的道路。中国长期处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从来没有什么议会政治的传统。过去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其实这只是有利于“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的更替只能通过武装斗争，别无其他良策。现今，国家已经富强，并且逐步走上民主与法治的轨道，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前贤追求民主法治的真诚努力，从他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智慧，走出政治制度改革的瓶颈，建设更为完善的中国先进政治文明。

第三是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但在百年之后却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谋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过去曾被讥评为徒托空言，其实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还是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讨论，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20世纪初始，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极为幼弱时期，1905年提倡“节制资本”诚然是“睹其祸害于未萌”，但现今对于中国而言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我们虽然标榜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因此，最近几年，政学各界及媒体、网络苦心焦虑，“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已成明日黄花，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

发。孙中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贫苦民众有本能的同情；他自己又在海外生活时间甚久，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理解最深。这样的领导者，郑重提出的政治设计必定有其现实根据，更有丰富的思维蕴涵，我们理应加以珍惜，作为当前排难解纷的借鉴。

最后还有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临终仍不忘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他为人题字，书写极多的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应该是近代中国最高层政治领袖中堪称“世界公民”的第一人。

晚年的孙中山，不再简单地以东方、西方或者肤色差别划分世界，而是把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他呼吁全世界“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所谓“受屈人民”，不限于被压迫民族，也包括压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以及虽已强大然而真诚支持世界各国“受屈人民”的苏联人民。他甚至天真地把“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劝说日本“联苏以为与国”，共同支援亚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斗争。这可以认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升华。

孙中山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终极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他期望以苏联人民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从而实现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

百年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与后冷战的国际格局演变，与孙中山的理想相去甚远。但是他的总体思路，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深沉思考，并非纯然是美好的空想，仍然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现实依据。在全球化潮流席卷整个世界，人类已经进入网络化信息时代的今天，正确处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极为复杂而又必

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当前某些政论家正在构思的所谓“全球地方关系（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与孙中山的思路正相呼应，似乎一脉相承。

举一反三。中国现代的历史叙事，党派成见影响甚深，意识形态束缚尤多，所以很难求得客观、公正、深切的理解。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思想的解放，对中国、对世界，于学术、于现实都大有裨益。我认为这是对辛亥百年最好的纪念。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学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隆重推出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包括学术研究系列和人物文集系列，总计多达30余种著作。这套文库的出版，称得上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尽管由严昌洪教授担任主编的十卷本《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等新书未收入文库，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但这套文库仍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多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从1978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再到2000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数十年来虽历经人事更替与诸多困难，但辛亥革命史始终是我们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其间不断有新成果问世，研究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心血，从现今出版的这套文库更不难窥见一斑。

当然，这套文库所收录的著作，无论是学术研究系列还是人物文集系列，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尽完善之处，希望能够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批评与指正。

编辑说明

一、本集收录 1900—1919 年的马氏著译及此后马氏回忆这段期间活动的文稿，根据单独发行的马氏著译和散见于《清议报》、《新民丛报》、《大陆》、《译书汇编》、《政法学报》、《复报》、《民报》、《竞业旬报》、《南社丛刻》、《民立报》、《申报》、《中华新报》、《民国日报》、《大中华杂志》、《宪法公言》、《学艺》、《建设》、《逸史》、《广西大学周刊》等报刊以及《临时政府公报》、《军政府公报》、《马君武先生纪念册》、《革命文献》等资料中的马氏著述编辑而成。

二、本集编排分文集、诗集、附录三部分，各以时间先后为序。原作未署时日者，经考证鉴别，置于相应之处；暂难考证而发表于当时报刊者，按发表时间编排；连续数次刊毕者，按最先刊登月日编排。

三、本集文稿，均于末尾注明刊期。作者署名，除“马君武”三字不另标明外，悉录于刊期之后。

四、本集文稿，均采用原有标题；原无标题者，编者根据内容酌加，以 * 号注于题末。

五、本集文稿，均予标点。作者原注，用（ ）标明；订正错字，置于〔 〕内；增补脱字，置于〈 〉内；衍文用【 】标出；缺字或原件难以辨认者，用□标明。原文未毕，于文末注明。原引外文错讹之处，则径行订正，不另注明。外国人名、地名与今译有出入者，酌加注释。

六、作者毕生撰著以译作居多，故酌情收录《斯宾塞女权篇》、《自由原理》、《民约论》三文。作者此时署名的译作尚有：《达尔文

物竞篇》、《达尔文天择篇》、《斯宾塞社会学原理》（均属少年中国新丛书）、《人与下等动物之心才比较》（载《政法学报》癸卯年第3期）、《酒类化学》（载《寰球中国学生报》第3期）、《微积分方程式》（商务印书馆1911年出版）、《赫克尔之一元哲学》（载《新青年》第2卷第2~5号）等；此外，作者译介工业矿冶知识的文章如：《汽机重学》（载《醒狮》第3期）、《矿物结晶说》（载《醒狮》第4、5期）、《炼锡法》（载《矿业杂志》第1卷第2期）、《结晶学》（载《矿业杂志》第1卷第3期）等，均未收入本集。作者留学日本时编著的《新文学》一书，亦付阙如。

七、作者诗作曾于1914年6月由上海文明书局结集出版，名为《马君武诗稿》（以下简称《诗稿》）。作者逝世后，由广西马君武先生治丧处刊行的《马君武先生纪念册》（以下简称《纪念册》），全文收录该《诗稿》，并略有更正，疑秉作者生前修改之意。故本集据《纪念册》录入，而将《诗稿》中有出入之处列于校注。作者各首诗作，凡曾结集于《诗稿》者，均不再注明刊期；《纪念册》增录之诗，于题后加注说明；本集增录之诗，于诗末标明出处。

八、1984年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马君武先生文集》，披露该会所存君武致孙中山的四封信函和所作《无题》诗一首的原件，本集扬其所长，予以转录，顺致谢忱。唯台湾版征引的报刊资料匮乏不全，有关1900—1919年的君武著述，仅据《清议报》、《新民丛报》、《民报》、《南社》、《民立报》等报刊辑录，其中还间有疏漏；加上台湾版未能征引《大陆》、《复报》、《译书汇编》、《政法学报》、《竞业旬报》、《申报》、《大中华杂志》、《民国日报》、《中华新报》、《宪法公言》、《学艺》、《军政府公报》等报刊资料及其他单独刊行的君武著述，致使辛亥革命前后的君武著述依然大量失散。本集力补其短，多方搜集有关资料，与台湾版所录同期君武著述相比，增补文章65篇，诗8首，还增补君武回忆自述2篇。台湾版收录的“与胡汉民、黄兴等请咨参议院提议设立国史院并派专员筹办呈”（见《临时政府公报》第41号），已收录于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黄兴集》内，故本集不再赘录。本集还对台湾版篇目所注时间、地点的失误之处予以订正。如台湾版所录“致胡汉民告以居桂生活情形函”，其时君武在“粤”而非在“桂”，故予删改；台湾版所注“无题”诗的时间为“民国七年双十节”，

据所刊原件照片，应为“民国七年双十节后一日”，即 1918 年 10 月 11 日。此外，本集还对台湾版不曾考订的诗歌时序予以考证梳整。本集的出版，或能聊补台湾版的疏误。编辑较为完备的君武文集殊非易事，海内外学者理当交流合作，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而努力。

九、本集编辑过程中，得到业师章开沅先生的鼓励和作者次公子马卫之先生的指导，得到唐文权老师的支持，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周元高老师和苏州图书馆陈雷同志的热情帮助，还得到同窗虞和平、桑兵、张富强、郭国灿、李向平、钱坤等学友的大力协助。谨在这里向他们表示至深的谢意。编者的亲密伴侣陈红同志承担了大部分文稿的标点和抄录，为本集的编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其间的情意已非言词所能酬答。

由于编者学识有限，且受客观条件制约，本集选录及注释难免有疏误之处，恳请批评指正，以匡不逮。

前 言

江南握手笑相逢，识得而今马贵公。

海内文章新《雅》、《颂》，樽前意气旧英雄。

摆伦^①亡国哀希腊，亭长何年唱《大风》？

右手弹丸左《民约》，聆君撞起自由钟。

诗人柳亚子在清末写下的这首“怀人诗”（《磨剑室诗词集》上集第36页），形象地描述出当年马君武一手赋诗作文鼓吹革命，一手研制炸弹倾覆清廷的英姿，概括了马君武在辛亥时期的历史功绩。

马君武（1881—1940），是近代中国杰出的革命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第一个在德国获得工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他出生在流寓广西恭城县衙署的一个湖北籍幕僚家庭。他的一生，可以依其驰骋政坛与执教校园，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从事政治活动，约从1900年参与康有为等人策划的“勤王”之役起，至1926年春退出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止；此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终至1940年病逝于广西大学校长任上。在马氏前期活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他在辛亥革命前后各约十年间的奋斗历程。其时适值旧民主主义革命兴衰起伏，时代的风云变幻导出一幕宏伟悲壮的活剧，马君武便是其中声名卓著的一位要角。本集因此辑录1900—1919年马氏的主要著译及其此后的有关回忆，俾有助于读者了解马氏在此期间的活动乃至近代中国的政局变幻。

① 今译拜伦（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一)

19 世纪末叶的广西，虽然依旧闭塞落后，当时的省城桂林却也开始渗入文明开化的时代新潮。1894 年底和 1897 年春，康有为先后两次到桂林讲学，倡议变法维新。变法运动夭折后不久，广西第一所施行新式教育的正规学堂——广西体用学堂在桂林正式开学。主其事者，就是几年前因不满清廷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而出任台湾“民主国”伯玺天德（总统）的广西灌阳县人唐景崧。唐与康有为一直交往甚密，他出而执掌教坛，遂使一度泛滥于桂林绅学界的维新改良思潮得以潜行不息。随母寄居桂林的马君武，在青少年时期就受洗于这股潜行的新潮中。

还在 14 岁的时候，君武已从邻里口中及时了解到正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台湾乙未之役，并且见到从台湾内渡返桂的唐景崧。在他的少年心中，涌起御敌救国的激情。君武 16 岁那年，康有为再次来桂讲学，并与唐景崧等人发起成立“圣学会”，刊行《广仁报》。桂林士人龙泽厚、况仕任、龙应中等师事康有为，成为“圣学会”的骨干。君武年少，未克入康门，遂从龙、况诸乡贤交游问学，阅览维新书刊，显露出追求新知的浓厚兴趣。据说，他曾署名“马恫”，撰文投送《广仁报》发表。其后广西体用学堂招生，君武名列前茅，尊唐景崧为恩师，专攻西学，旁涉经史，以“学为圣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励。由于君武等少年学生不满西太后等顽固派镇压变法，在日记作业中径直评点朝政得失，学堂提调陈绶琯以犯上违禁为由，出示惩戒。受惩学生愤而撕毁告示，君武与同学邓家彦、秦嗣宗出走香港。邓、秦二人转往澳门就读。年方 19 岁的马君武则以忧国伤时之心，立救亡图存之志，远涉重洋，来到新加坡，谒康有为，执弟子礼，从此开始救国拯民的政治活动。

从 1899 年底到 1900 年上半年，康有为一直在海外策划“勤王”之役，以图“保皇保国保种”。最初的战略部署是：“以全力取桂、袭湘、攻鄂，而直捣京师”（《康有为与保皇会》第 45 页）。康有为将广西列为“勤王”举义之地，除计划借助广西会党武装起事外，还欲倚重唐景崧秘密联络广西官绅起而内应。马君武是唐氏高足，他的到来有助于康氏了解与进一步布置广西方面的“勤王”行

动。因此，康即委君武以八桂始难重任，资遣返桂，伺机大举。君武慨然应命，赋诗言志：“书生誓树勤王帜，铁屋瀛台救圣躬。”（《感怀》）不料，就在他兼程返桂途中，传来唐才常等人在长江流域组织自立军起义惨遭失败的消息。清廷在南方各省通缉起事党人，维新派以武力勤王改制的计划完全破产。君武抵桂后，韬迹家中，无所作为，遂于1900年冬出桂求学。在漓江夜航的孤舟上，他追抚往事，对先前热衷的保皇改良之道产生怀疑，不由得怅然自问：“茫茫前路我何之？”（《漓江舟中》）

次年，君武留学日本，经汤觉顿介绍，见到改良派的另一位领袖梁启超。梁启超为时局激励，正倡导“新民”学说，强调救国亟须改善民德、民智、民力，造就自立于20世纪的一代新国民。“保皇”与“新民”，同属君主立宪政治方案制约下的策略口号，但后者倡言自由、平等、博爱的“国民精神”，对怀疑保皇之道却未矢志革命的青年学子来说，仍有新的吸引力。君武赴日前，曾赞同先启民智、后行革命的主张，即认为“今世之主张革命者，徒求效验而已，无造原因者；皆求为华盛顿、拿破仑，无甘为福禄特尔、卢梭者，此所以无功也”（《女士张竹君传》）。这一主张与“新民”说的论点颇为相似，君武因而对梁启超十分钦敬，赋诗赞其功同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壬寅春送梁任公之美洲》）。他积极为《新民丛报》等改良派创办的报刊译稿撰文，附从“新民”说的某些主张，鼓吹“欲改革中国，则必自改革中国之道德始”（《论中国国民道德颓落之原因及其救治之法》）。梁启超同样信任和倚重君武，1902年春梁离日赴美，曾延君武代理编辑《新民丛报》。梁、马交谊既笃，先启民智、后行革命的主张既近，勤力笔耕的马君武在1902—1903年间很有希望成为“新民”改良论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然而，就在这时，君武突然中断与康、梁改良派的长期交往，放弃维新改良主张，一变而成为留日学生中最早追随孙中山宣传和组织革命的核心人物，从此将民主共和政治作为毕生奋斗的目标。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毅然从改良转向革命的呢？

毋庸否认，人际关系的亲疏变化可以左右个人的政治选择，梁、马交谊的逆转成为君武转向的情感因素。当时，君武正当青春年少，希望在贫寒的求学生涯中找到挚诚的知己与伴侣。梁启超托

名“羽衣女士”，在《新小说》上连续刊出长文《东欧女豪杰》。君武羨其文而慕其人。梁等竟故意怂恿君武与子虚乌有的“羽衣女士”通函会晤，留学生界一时传为笑谈。君武纯真的感情遭受诓弄，愤而与梁等疏远。他与改良派的交往随之冷淡下来。

与此同时，君武与孙中山等革命派的联系却日趋密切，从而造成君武转向的有利条件。君武在1901年冬到达日本横滨之后不久，便由日本志士宫崎民藏介绍，结识孙中山。此时，孙中山已因倡导革命蜚声海外。与孙晤谈后，君武语人曰：“康、梁者，过去之人物也；孙公则未来人物也。”（邓家彦：《故工学博士马君武少年轶事》）这表明，他钦敬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视孙为继康、梁而后起的一代领袖人物。此后，君武按照孙中山的建议，离开改良派控制的横滨大同学校，到东京留学，住秦力山寓所。秦力山曾参与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流亡日本后便抛弃勤王改制主张，转而鼓吹“革命仇满”。相同的经历，使君武逐渐接受革命的影响。这时，才华学识与梁启超匹敌的章太炎也在东京鼓吹“种族革命”，君武乃从章学而益疏梁。

自然，个人的政治抉择不仅仅为私人交谊所左右，最终还要受时局发展所制约。在紧迫险恶的内忧外患面前，“保皇”、“新民”的改良主张毕竟显得过于软弱迂缓，唯有以革命开启民智、倾覆清廷以拯救中华的激烈主张，最能沸扬青年学子的一腔热血。因之鼓荡的革命风潮，便成为君武转向的根本动因。1902年4月，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在东京发起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以纪念明朝灭亡为名，鼓吹反清革命。在清政府与日本当局的威胁下，梁启超等一些署名赞助人先后惧祸退出。发起人名单上最后只剩下10人，其中一人便是马君武。君武从此在政治上与改良派分道扬镳。1903年1月29日，君武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旧历新年恳亲会上率先登台演说，“主张非排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不足以救中国”（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说到义愤填膺处，他不禁声泪俱下。湖北留学生刘成禺继之而起，重申革命排满主张。马、刘二人的演说使留学生会馆响彻革命的呼声，与会清朝官吏惊恐不已。据刘成禺回忆，此次演说，乃遵照孙中山事前布置而行，旨在震慑清廷，影响全国。不久，留日学生掀起“拒俄”运动，要求沙俄撤兵东三省。4月30日，上海绅、商、学界千余人

举行集会。蔡元培致开会词后，君武上台演说，呼吁保全中国国土主权，并领与会人员同唱《爱国歌》。“一时，爱国之忱随声而起，闻者莫不感发热诚。”（《苏报》1903年5月1日、8日）

君武在洪波初泛的革命浪潮中锻炼成为矢志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先行者。当这年8月出版的《新民丛报》连续刊完他写的《弥勒约翰之学说》一文后，他不再向该刊供稿，以示与改良派断交。9月间，君武与廖仲恺、何香凝等人专程谒见孙中山，真诚地“表示赞成革命”。孙中山“乃托以在东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此事可以视为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先行者服膺孙中山领导的开端，君武等人从此协助孙中山发动和团结留学生团体开展革命活动、创建革命政党。孙中山十分重视此次与廖、马等人的会晤。十余年后，他总结革命历程，对此仍记忆犹新，赞此于“同盟会之成立多有力焉”（《孙文学说》）。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事前，君武与黄兴、陈天华等8人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起草员。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君武提出联合满人反对满清政府的革命主张，得到与会者赞同。据当事人回忆，当孙中山在会演讲时，有人发问：“我们是要排满革命，假如有满人要加入同盟会，我们怎样办？”君武当即站起来回答：“我们是反对卖国亡国的满洲政府，如果满人中有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我们当然欢迎。”话毕，与会者全体鼓掌，孙中山也鼓掌（李四光：《在辛亥革命中的马君武》）。显然，君武道出与会者一致的见解，他们共同择定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

（二）

1902—1903年，既是君武在政治上重新作出抉择的关键年代，又是他在笔耕中首获硕果的丰收时节。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君武以惊人的速度、达雅的文笔，接连翻译出版了日本福本诚《法兰西今世史》，英国达尔文《天择篇》、《物竞篇》，斯宾塞《女权篇》、《社会学原理》，穆勒《自由原理》等著作，还发表译介了西方新学和抨击时弊的文章二十余篇。虽然这些著述大多是在梁启超等改良派赞助下作为“新民”学说的附属宣传品问世的，可是它们实际上已经突破“新民”学说，而从不同的侧面为即将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